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

第三集

96.10/10

解放军出版社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

第三集

王成斌 刘炳耀 主编
叶万忠 范传新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460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南昌)第1次印刷

印数 1—41 000

ISBN 7-5065-0918-0/K·82

定价: 4.90 元

主 编 王成斌

刘炳耀

副 主 编 徐好文

周志明

本卷编写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一 文

王振京

尹丕杰

苏志荣

陈贞寿

周志明

胡必林

高 原

徐好文

黄增章

程昭星

叶万忠

胡必林

万凤琪

少 卿

王禄斌

冯 璜

杜思

张世

范银

胡初

姚 耀

徐光辉

龚 屏

蓝 叶

范传新

苏志荣

王 刚

王 劲

牛先宾

许 欣

陈 英

赵建群

胡其即

崔 鸿

徐 星

崔 南

崔 星

范银飞

胡初萌

王希亮

文热心

李 直

国 全

顾 康

良 闻

唐 仿

唐 寅

唐 寅

唐 寅

唐 寅

出版说明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大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适应这一形势，我社与南昌陆军学院商定，于1985年7月开始编撰《民国高级将领列传》。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所介绍的对象，主要是1925年至1949年期间的上将，以及一些职衔不高但与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社会影响较大的将领。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者未列入编撰范围。重点是记述他们从军、从政及其他方面的重大活动，力图比较系统地再现纷纭复杂的民国史、军史，希冀深刻揭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谛，希冀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翔实而鲜为人知的史料介绍，有利于中国革命史的教学和研究，有利于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从一个侧面增长历史知识，更好地了解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历史，深刻地理解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对于振兴中华，使之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意义。

这部书，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把政治性、军事性、史学性和文学性有机地统一起来。特别注意坚持三个为主：首先是以尊重客观史实为主。对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功过是非，均以事实说话，尽量少作评论。其次是以写重大历史事件为主。注重反映人物的主流，对生活方面的问题，不铺陈、不渲染，点到为止。再次是以军事活动为主线体现人物的社会角色作用，力求简化作战过程，着重描述人物在重大战役战斗中的战略战术思想与指挥艺术，主政或参政活动突出独特作为，以体现高级将领的特点。

编撰此书的资料来源比较广泛，有国内的，也有海外的。但其主要来源是：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和工具书；全国各级政协、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历年搜集的文史资料；全国各出版单位出版的回忆录、名人传等；以及作者走访撰写对象的亲朋好友所获的一些原始资料和口述材料。选择资料时，注意多方面地进行比较、鉴别和考证。对那些众说纷纭的资料，一般的处理原则是：原始记载的与回忆的，以原始记载为准；第一手的与经过加工的，以第一手的为准；当事者提供的与间接者提供的，以当事者的为准；多数人的说法与少数人的说法，以多数人的说法为准；正式出版物与民间流传的，以正式出版物为准。不少稿件还经过有关部门的领导、专门研究人员，及撰书对象的家属、同事的审核，有的还与本人见过面，力求使资料更准确和权威性。

这部书将分期陆续出版。分期顺序按各省区属的先后顺序。各册人物编排的次序，按姓氏笔画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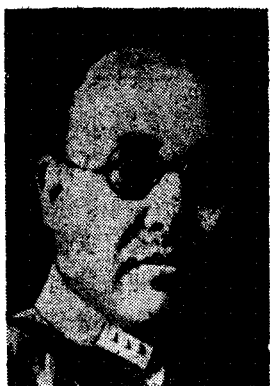
这部书的编撰工作得到全国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政协、统战、联络、历史研究等部门的鼓励和支持。有的单位为此专门拨给经费。作者遍布于全国的许多文史研究室、社会科学院、地方与军队的高等院校、报刊杂志社等单位。他们当中，有长期从事民国史研究的专业人员，有教授、讲师、记者、编辑，还有一些知名人士、业务领导。年龄最大的八十多岁，最小的只有二十来岁，绝大部分是中年知识分子。他们积极、热忱、严肃、认真，有的为了保证稿件质量，不厌其烦，一改再改，反复斟酌；有的为搜集和核实资料，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多次到撰写对象老家走访。在此书问世的时候，谨向热心此书编撰的领导、作者，以及有关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

系统地编撰《民国高级将领列传》，在全国还是第一次，难度较大，难免有疏漏、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补充修订。

目 录

马鸿逵.....	(1)
王陵基.....	(14)
文.....	(38)
刘茂恩.....	(69)
白崇禧.....	(83)
冯治安.....	(118)
朱怀冰.....	(135)
汤恩伯.....	(146)
陈 仪.....	(162)
陈 诚.....	(186)
陈明仁.....	(225)
陈绍宽.....	(243)
李 杜.....	(258)
李默庵.....	(276)
邱清泉.....	(290)
宋哲元.....	(310)
谷正伦.....	(329)
张 轸.....	(350)
庞炳勋.....	(368)
金汉鼎.....	(384)
俞济时.....	(397)
夏 威.....	(410)
钱大钧.....	(425)

黄 维.....	(440)
黄镇球.....	(453)
蒋方震.....	(467)
韩复榘.....	(506)
熊式辉.....	(534)
薛 岳.....	(550)



马 鸿 逵

(1892—1970)

马鸿逵，乳名三元，字少云，回族。陆军上将，西北军阀“三马”之一。先依附冯玉祥，后投靠蒋介石，任宁夏省主席长达十七年，集军政大权及国民党党务于一身，被人称为宁夏的“土皇帝”。

马鸿逵，1892年3月9日出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县）韩家集阳洼山村。祖父马千龄，在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时，因劝说马占鳌（马千龄的同族侄女婿）降清，被左宗棠称之为“良回”。这就是马鸿逵后来自诩他家“不是造反的回回”一语的原由。光绪初年，马千龄次子马福祿中武举人、武进士。

1895年，河湟地区（今甘肃临夏及青海东部黄河、湟水流域）的回族、撒拉族人民再次发动反清起义，马千龄率其子组织民团，对抗起义军，曾解救被围清军总兵汤彦和。起义群众将马千龄家宅院付之一炬，并到处“捉拿马进士家的人”，马千龄趋避藏区，其次子马福祿和四子马福祥（马鸿逵父亲）率民团辗转到兰州，被陕甘总督陶模收编为步骑两营，加入进攻河州之清军，不久归入董福祥的甘军。这时，清政府整军，董之甘军编为精锐后军，马

福祿、馬福祥分任其下的統領、幫統。董軍奉調北京附近駐防後，八國聯軍進犯津、京，馬福祿率部在正陽門同八國聯軍戰鬥時身亡。馬福祥率余眾護駕慈禧、光緒到瀋陽。

馬鴻逵父親馬福祥先後任清政府西寧鎮總兵兼阿爾泰護軍使、綏遠都統。1925年，依附馮玉祥，任西北邊防會辦（馮為督辦）。1928年，馬福祥轉投蔣介石，歷任國民政府委員、北平政治分會委員、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青島特別市市長、安徽省主席，旋調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1932年病卒於涿州琉璃河旅途中。其政治手腕靈活，長於交際，善於游說，常以在政爭中當“調人”自居。這些都為馬鴻逵進入軍界政壇打開了廣闊的門徑。

馬鴻逵八歲在西安行宮中得見慈禧、光緒、隆裕、李蓮英、小德張。十二歲，其父馬福祥以一等毅勇侯為他買得“藍翎知縣”虛缺。1909年，馬鴻逵結束在私塾中學學習，赴蘭州考入陸軍小學堂。學習期間，他對於軍訓體操及軍事學科，均感興趣，唯不喜歡英文、日文，考試前輒往教官處索題。教官莫奈其何，只得為他圈定“重點”。1912年，馬鴻逵在其父部下任營長，繼升寧夏新軍統領。1914年至1917年，馬鴻逵在北京先後為袁世凱、黎元洪當侍從武官，對統治階級最高層官場的活動，頗多了解。袁氏稱帝，馬福祥錯估形勢，上京勸進，被封為男爵。及張勳復辟，馬鴻逵將北京情勢預為電告，馬福祥通電拒絕復辟“朝廷”委其的甘肅提督的任命。此後馬氏父子對前事諱莫如深，對後事則大肆宣揚。其時，馬鴻逵還悄悄離開北京，跑到天津，參加段祺瑞的馬廠誓師，當了討逆軍的中將參謀。段祺瑞重新上台後，欲收馬鴻逵為羽翼，撥給日式輕重武器及經費六萬元，授他為第五混成旅旅長，令其擴編寧夏新軍。

二

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馬鴻逵與其父在這場鬥爭中，

开始一直不作表态，恐有所失。直系获胜后重新任命各省督军时，马福祥被提名为甘肃督军。后因甘肃地方军阀意见不能相一，遂作罢。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都想拉拢马福祥父子。马氏父子均以模棱两可的态度应付。当直系要求马鸿逵出兵助战时，他们即以“防地匪患未清，不能调离”为辞作复；当接到张作霖请求派兵支援的信后，也以“绥远地方不靖”，一旦大军离去，“匪势坐大，不可收拾”作藉口，婉言拒绝。可是当奉系败北的消息传来时，马福祥立即通电讨伐张作霖，呼其为“胡匪”（指土匪），直揭张的老疮疤。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掀起。这次，曹锟、吴佩孚先发制人，在进行部署时即派马鸿逵为骑兵总指挥，令率部开往热河前线。马氏父子故技重施，只得成行。战争进行中，冯玉祥倒戈，返回北京，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并发出了呼吁和平的通电，是为“北京政变”。马鸿逵闻风转向，权衡得失后也尾随冯玉祥撤退，把部队带到北京。这时，参与推翻曹锟、吴佩孚的奉系张作霖也来到北京。马鸿逵急忙前往拜谒，乞求谅解。张作霖一开口就说：“前次我与曹、吴之战，曾请你父亲派兵支援，你父亲未答应，实在对不起我！”使马鸿逵至为尴尬。

1925年3月，冯玉祥正式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后，开始着力经营张家口以西地区。马福祥父子迫于冯军势力，仍采取以退求存手法，对冯表示顺从。马福祥将绥远都统交给冯军大将李鸣钟，自己担任了没有实权的西北边防会办，其部队则交马鸿逵带领。冯为安慰马氏父子，委马鸿逵为第七师师长。

这年10月，冯玉祥部的第二师在刘郁芬率领下进入甘肃。时马鸿逵部队驻宁夏的金积、灵武，他特地赶往兰州，引介甘肃回军其他人物马麒、马廷勳等与刘郁芬见面。这样，一方面狐假虎威，借冯玉祥势力，在地方军阀面前抬高的自己的身价；另一方面又借回军力量，向冯玉祥部队显示了自己的重要。

1926年9月，冯玉祥游历苏联后返国，举行五原誓师，宣布响应南方北伐。在冯要求下，共产党人刘志丹被组织上派到马鸿逵部（时扩编为国民联军第四路军）任政治处处长。马部当时在刘志丹积极开展的革命宣传的影响下，参加进军甘、陕，在西安解围战斗中，官兵牺牲甚众。马鸿逵晚年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说：“刘为人做事，精明能干，学识广博，又能吃苦耐劳，对本部贡献甚大。”

1927年初，马鸿逵任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军军长。5月，冯军东出潼关参加北伐。马鸿逵部主力配属孙良诚指挥。当战事胶着之时，马部骑兵第一师第一旅，联合郑大章之骑兵师，由龙门以南登封通过京汉线，迂回到开封以东，破坏陇海铁路，切断奉军后援，冯玉祥部队遂占郑州、开封。

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谈后，声明反共，“礼送”第二集团军的共产党人离去。马鸿逵逼刘志丹离开了开封。此后马受冯、蒋指挥往山东一线作战。

三

1929年春，蒋介石一手包揽大权的编遣会议和国民党“三大”召开之后，新的军阀战争开始酝酿。当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已隐隐可见，但尚未公开时，马鸿逵颇为如何自处而苦恼。他怕开罪于冯玉祥，不敢贸然接近蒋介石。为此，对于蒋介石在公开场合向他表示的关怀均佯装不能会意。有一次，冯玉祥在南京召集其部下军长以上将领十八人听训。每晚讲话，多抨击南京时政，并要求每人听后结合白天参观见闻，写出心得。马鸿逵托词“读书不多，不会作文”婉拒。当这些人集体拜谒蒋介石时，蒋对马说，“我们在归德见过一面”，又问他是否已见过父亲和家人（马福祥时住南京），马装作不懂其奉化方言，蒋只好“啊

啊”而过。隔日，蒋、冯设宴招待他们一行，他人纷纷前去，到蒋、冯及宋美龄、李宗仁座前敬酒，唯马以“不善饮酒”为词未去。马鸿逵还辞谢了蒋介石通过其父转达的单独召见的邀请。但北上山东驻地后，他却写长信派人密送蒋介石，信中除“对在京若干失礼之处，深致歉意”外，还报告了冯玉祥言行，最后声明，自己“决不参加背叛中央之任何军事行动”。

1929年5月，冯玉祥决定反蒋，命所部由山东、河南向郑州、洛阳集中。马鸿逵部到开封时，韩复榘从潼关赶来，两人密议反冯投蒋之事。然后韩先返回洛阳预作准备。马鸿逵率领部队到洛阳，即参加联名通电拥护“中央”，维持和平，署名者尚有石友三、庞炳勋等。韩、石、马倒戈，打乱了冯玉祥的作战计划。

马鸿逵公开依附蒋介石之后，为摆脱冯玉祥的军事围困，率兵东走郑州，并沿途炸毁桥梁，以阻冯军追击。郑州是冯玉祥军需供应中心。马鸿逵在此获得大批军火、粮秣。冯玉祥为扭转局面，屡电马鸿逵，温婉慰劝，望马部归返。蒋介石闻讯后，即派钱大钧、贺耀组、邵力子等前往郑州宣慰，给马鸿逵带去百万元的重赏，并在南京召见马。款待马的宴会，甚为隆重，宋美龄及国民党政府各院、部长均出席。最后又拨款几十万补充马的部队。因此，马鸿逵决心投靠蒋介石。不久，马部奉蒋介石之命调驻徐州。

1929年12月，唐生智联合韩复榘、石友三酝酿反蒋。韩以徐州重地，需要争取马鸿逵、石友三支持。韩又怕马中途变卦，派了一旅人马开往徐州。马鸿逵表面应诺韩的要求，暗中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一切，并条陈应付之方。蒋得到马的报告，一面设法稳住韩复榘，一面急调大军进攻唐生智。韩以局势不利，不敢助唐行动。唐军覆没后，马鸿逵让其父在蒋面前奔走调停，请蒋允许石友三“悔过”。

1930年3月，豫、鲁、皖上空战云密布，一场军阀大战迫在眉睫。马鸿逵严密控制津浦、陇海两线，为蒋介石部队输运军

火、军需。其时，铁路专供军运，客、货运输几近停顿。马自己乘机贩运倒卖海盐，牟利以百万元计。对此，蒋故意不追不究，分化马与韩、石关系。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蒋介石调顾祝同之第二军进驻徐州，马鸿逵部则被调到兖州、泰安一带，以隔开韩复榘部队与冯军的接触，避免韩部阵前倒戈。接着，蒋发表韩为山东省主席，使其脱离战场；马鸿逵调驻鲁西及山东陇海线右翼。这时，石友三复叛蒋投冯，进攻曹州（山友菏泽）甚急，马奉蒋令驰援，石部退向东明，马部亦调往陇海线作战。这时马部已正式扩编为讨逆军第十五路军。当晋军在傅作义指挥下，攻入济南时，马鸿逵部队大部分撤至邹县、滕县布防。蒋介石令韩复榘反攻济南，韩在青岛摇摆不定，大有被阎、冯拉去可能，韩如一旦有变，则马鸿逵很有随韩而去之虞。蒋因此多次致电给马，以“岁寒知松柏，板荡识忠臣”相勉，并请马鸿逵去青岛说服韩复榘，稳定其心。

7月，战况变化，蒋介石的部队重新集结，攻陷亳州，解除了侧背威胁；月底，大举反攻，马鸿逵军复占泰安。蒋介石论功行赏，马部增加了两个旅的编制。

1931年1月。蒋介石“围剿”鄂豫皖苏区时，调马鸿逵部到河南许昌、漯河一带。马鸿逵设总指挥部于信阳，指挥其部参与了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但他鉴于黄杰和曾万钟部俱被红军击溃，岳维峻被红军活捉的前车之覆，一度装病，迟迟其行，招致蒋介石的不满。后又发生刘峙部包围马部的事件，主要原因是马鸿逵丢失了鸡公山，堂堂“国军”败在了共产党的一支游击部队手下，不能不使身为河南绥靖主任的刘峙大为震怒。后由马福祥出面斡旋才罢休。

四

1932年8月，蒋介石已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但马鸿逵

希冀河南省主席一职，长期滞留中原，宁夏省政由他人代理。蒋介石亦曾有意给他河南地盘，一是利用马鸿逵积极参加对红军的“围剿”，二是以慰马氏家族失掉甘肃之抑郁（马鸿宾正式就任甘肃省主席二十天即因“雷马事变”而下台）。后来因刘峙报称马鸿逵贻误军机，蒋介石改变主意，不仅不发表新职，反以刘峙压迫马鸿逵，马处境窘迫呼援无门（马福祥于1932年夏死）。恰这时甘、宁政局紊乱，蒋介石要他回宁夏就职，于是急急赶回西北。

离开河南时，接蒋介石的命令，马鸿逵部队基本不动，由马
)，后不得... 则交马鸿逵，双方互换番号。马鸿
除在宁夏... 市直属部队返宁为理由，连夜选拔精壮，密藏优良
武器，于隆冬寒天，将部队运往包头，再由包头步行，星夜兼程
进驻宁夏。留在河南的部队，只是一些老弱病残而已。后马鸿宾
又托词留在了宁夏。此后，两马之间为地益和军饷产生了许多矛盾。

1933年初，马鸿逵正式就任宁夏省主席职务。他摆出一副励精图治的姿态，提出了“实行三民主义”、“消灭烟毒土匪”两大施政目标，手订公务人员“行为准则”的八项要求，甚至连官吏、职员着装都有规定（必须一律短装）。马鸿逵真正的信条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他的一切活动无不是以“抓兵”、“抓权”、“刮钱”为目的展开的。

马鸿逵不断地补充军队，由1933年仅有一万二千兵员扩大到四十年代末的十万人，占宁夏人口的七分之一。富户雇人当兵，后因可雇壮丁越来越少，“兵价”也水涨船高，达到白洋三四百元。贫户则举家逃亡，或自残身体，凄惨之景，处处可见。为了控制士兵逃跑，马鸿逵规定了兵逃罚主户（出兵的人家）及严惩逃兵的许多具体办法，并常常成批枪毙追回来的逃兵。

为了独自控制地方政权，马鸿逵处处安插亲信。宁夏当时交通落后，生产极不发达，加以位置边远，蒋介石感到无须控制太

严，决定宁夏省政府委员、各厅、处长，除教育厅长外，其他均由马鸿逵自行提名保荐。尽管如此，马仍然一连赶走了五个国民党政府派来宁夏的教育厅长，最后由他自己保荐亲信杨作荣上任。马鸿逵以军管政，以政管党，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及各县党部，都在他的操纵之下。

马鸿逵嗜财如命，他抓钱的办法有：清丈土地，增加征粮征款，垄断宁夏贸易和金融，缉他人走私，自己则走私烟土，开办工厂，搞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敛财；借整顿税收之名，行增加税款之实，一时局卡林立，百物皆税；尅扣军队及公务员薪饷，马部士兵津贴一向低得不能再低（一元至一元半），后不得不提高后，又强行“储蓄”，扣而不发；收地租房租，他除在宁夏占有土地房屋外，房产布于平、津、宁、沪、渝，以及西安、兰州、包头等地，有的作商号，有的开金店、办澡堂，其余专收房租。

1934年初，孙殿英在蒋介石诱使下，移兵西来，声言借道宁夏前往就任其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之职。马鸿逵深恐孙来西北夺了自己的地盘，一方面说动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请求蒋介石收回成命。另一方面调集大军，严阵以待，决心与孙一决雌雄。当孙军兵临宁夏（今银川）城下时，马鸿逵、马鸿宾全力阻击，同时向蒋介石、朱绍良以及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电报告急。朱绍良迅速调兵增援，马步芳先已派兵进驻宁夏，此时也亲来督师。战争愈益升级。其间，蒋介石下令双方“停战”，但毫无效果。由于马鸿逵以重金收买了几个孙军将领，孙殿英部队全线动摇，孙不得不于3月19日下令总退却。阎锡山出兵截孙后路，何应钦指挥五省兵力进剿。孙殿英在绥西一筹莫展，宣布离军，余部三万余人，被阎锡山、胡宗南收编。借拒孙之战，马鸿逵增编了三个团级警备大队，又收编孙殿英处过来的杨干卿旅。

“西安事变”发生后，马鸿逵心惊胆战，恐怕失去靠山，但不能预料事态发展动向，不敢表态。他恐张学良、杨虎城从此得

势，自思不能预留地步；又虑胡宗南、关麟征等蒋之嫡系军队近在肘腋，一旦响应张、杨，日后必被消灭。此时，他心里矛盾重重，竟见人就哭。及各方态度明朗，蒋介石有释放可能时，他乃以倒填日期的办法发出通电，主张讨伐张、杨。“西安事变”结束，马鸿逵犹喋喋不休，先后发出十次通电，向蒋介石献殷勤，得到了蒋的好感。

马鸿逵抗日的态度是消极的。宁夏地接绥远，当华北危机日趋严重的时候，日本间谍先是潜入绥、宁交界地区活动，进而深入宁夏各旗，并通过这里向甘肃酒泉、武威发展活动。马对此一度知而不问，助长了日本间谍的气焰。相反，马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命令却执行得很及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马鸿逵即以防备和阻遏陕甘宁边区的发展为己任，多次向蒋介石呈进“意见书”。时蒋介石曾亲飞宁夏，布置防务。马在此前在宁夏省城中山公园内，专修“怀远楼”，以宣扬蒋的“关怀”边陲。蒋到后，他亲自担任守卫，表示忠诚。蒋走后，马立即划分全省为三个警备区，此后不断骚扰陕宁边区，一度攻占三边（安边、定边、靖边），但很快被红军逐出。整个八年抗战期间，马鸿逵直接掌握的部队未进入对日寇作战的战场。他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从事的活动，除了巩固宁夏地盘，就是对付陕甘宁边区。

在民族宗教问题上，马鸿逵为了迎合蒋介石，创制奇说，到处讲“回民是回教，不是回族”。另一方面，他却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利用回族身份拉关系，拢人心。1940年，马秉承蒋介石之意，促成“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成立，由白崇禧当了理事长，白反过来立即聘马步芳和马鸿逵当名誉理事长，三个人都提高了身价。

蒋介石利用白崇禧联络西北诸马，可是又不愿白的力量伸向西北，马鸿逵善体此意，暗拒白崇禧设法来西北“主持军政”的活动。但马也了解白在国民党军政界，特别在桂系中是有影响的

人物，能接近时就接近。他率先在宁夏成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宁夏分会”，通过该会控制宁夏近二千名阿訇，发给他们以规定津贴，提出筹集百万教育基金，为各清真寺购置“俄格夫田（义田）”的提议。这样，既利用宗教加强了它的统治，又在白崇禧面前获得了好感。

1943年，马鸿逵乘内蒙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与国民党军陈长捷发生矛盾，以协助第八战区长官朱绍良调停为名，派兵入鄂托克旗之阿拉庙。后虽退出，但却以该旗保卫者自居，向该旗发展势力，外运该旗特产冰碱、皮毛、甘草等，把鄂托克旗变成了自己的敛财之地。

马鸿逵在宁夏长期实行所谓“合署办公”，其总司令部和省政府的主管各部门的人员，每天早上到总司令官室外等候召见。前者出，后者进，依次问安、汇报。马鸿逵高坐太师椅上，根据自己的好恶发号施令。他的办公桌旁另设椅凳，召入者只能站着回答，如同蒙童背早课。僚属们谓这种作法为“上朝”。马遇事外出，军政事务则由其次子马敦静代行。马敦静每于此时昂然出入省政府办公厅，执笔乱批公文，各属官恭敬听命之态，一如对马鸿逵本人。

五

1945年冬，蒋介石违背刚签订不久的《双十协定》，调遣傅作义沿平绥线推进，包头以西空虚。马鸿逵奉命进驻河套地区，策应绥（归绥，今呼和浩特）、包，抵挡贺龙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向绥、包的反击。马认为这是占据河套的大好机会，拟派主力前往。但旋得到原驻该地区内的何文鼎师被歼的消息，就只派副军长马全良领两旅骑兵前往，并囑相机行动，以免损失实力。后在蒋介石一再催促下，进驻包头附近。时董其武有将宁夏骑兵与绥远骑兵统一序列，便于指挥之议。马鸿逵坚决拒绝，把宁夏部队